

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中的孔孟之学、荀学思想分析

咸嫫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当初孔孟之道所提倡的“独尊儒术”中的儒学在汉代的发展历史过程当中已经被逐渐的模糊化, 荀子的荀学思想在适应历史转变发展的过程中被吸收其中, 两者相互依存使君权至高无上性又被抬上了新台阶。在古代中国哲学的演进中, 孔孟之学与荀子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差异, 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成为一段扭曲而丰富的历史篇章。本文将探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儒家思想的交融关系, 分析孔孟之学与荀学思想的观点对比, 揭示孔孟之学、荀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独尊儒术; 孔孟之学; 荀学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班固在《汉书》中写道:“自武帝初立, 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 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 州郡举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因此, 很多人会认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是在汉武帝时期由董仲舒提出的说法, 实则不然。自上世纪末以来, 很多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一直在批判地研究“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这种提法。他们经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西汉时代没有这种说法。如学者郑济州在《独尊儒术新批判今古变异与董仲舒之真意》一文中提到蔡元培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从追求自由和独立这一学术思想和价值取向出发批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所以学者郑济州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论调最早为蔡元培所创。但他并不赞同蔡元培先生的观点, 认为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词结合在一起之后其意思具有强势性, 具有非常浓厚的褒贬色彩。而古代的学者崇尚的则是一种肯定态度, 他们是站在肯定的立场上来认识和思考“罢黜百家, 六经”和“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的。关于古代有无“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论调, 目前在学术研究领域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 还需要更多的调查与分析。本文沿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论调, 分析汉武帝时期所崇尚的儒术中, 孔孟之学和荀学思想分别扮演何种角色, 以及两者在“独尊儒术”中分别发挥何种作用。

西汉初年战争结束后, 统治者无暇关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汉惠帝给私学的复兴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到景帝时, 黄老“无为而治”已成为执政指导思想, 轻松的文化环境为先秦诸子百学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汉初诸家私学的勃兴, 虽然对学术文化复兴与国家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 但过松的统治政策却导致了国家礼乐制度的衰落、诸侯国之间的战乱等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问题, 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的统治和稳定。汉武帝时, 董仲舒上奏“天人三策”, 提出“新王改制”、“大一统”、“兴太学, 举贤良”、“尊儒”等主张, 认为解决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推明孔氏以抑黜百家”以确立儒家“大一统”的地位。狭义的儒术是指建立在六艺之学上的孔门学术。武帝初年, 儒术主要是

指与朝代仪式化的形象、制度有关的学问、政策等，大体上属于行政实践范畴——“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这些都属于武帝时期的“儒术”，受到班固的表彰，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仪式性的作用。更进一步说，汉武帝尊儒实际上可分解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礼仪制度上儒术；第二层面是六艺知识和思想层面的儒术。

一、孔孟之学思想分析

《论语·为政》中开篇便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为政以德”中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者，正也”思想，即为政者本身作为国家政治治理和政治指导应该具备德性；二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为政者要用道德指导人，用礼仪规范人的行为，让人有道德。孔子“政者，正也”的思想中的“正”不仅指向“君”还指向“民”。孔子既然强调为政者要有德有才，他就自然而然地提倡提拔贤能的贤人来参加政治治理和指导。如《论语·子路》中提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贤能的贤人对政治管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选择道德高尚的贤人来参与政治管理，更是民众的心愿。此外，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还追求人民群众有道德。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以政令指导百姓、以刑罚调节百姓、让其行为趋于一致，百姓只会一味地免除刑罚，内心却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羞愧；但若以道德引导人、以礼规范人、让人行为合一，则人不但会以不道德的行为为耻，还会积极主动地纠正行为以合乎道德。孔子倡导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更突出为政者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重视。因而，孔子在为政举措上必然反对暴政、苛政。孔子“为政以德”政治哲学思想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建立在人伦道德之上的政治秩序，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孔子“为政以德”中的政治哲学思想，不但没有将其集中于制度和法律上，还倡导建立一种在儒家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美德政治学。

《万章上》中写道：“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可以看出，孟子认为天选的君王在人中是先觉者，能对“道”有认识，所以他有义务用“道”来教育人。孟子王道思想中，天赋予君王权位是为了让君王教化民众。由此，一方面给君王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也表明天道最终指向人民之善性。孟子这里以“天”的权威性来强调君主教化人民这一政治责任的神圣性，从而达到约束君王的目的，表明君王在取得天赋予的权力后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应该把它当作传递“道”的先觉者来担负教化人民，唤醒人民的职责。除了强调“天”对君王的约束，君行王道，还主张君臣和谐。行政体系由君臣互相配合，各尽其职，共同建构。因此，孟子不仅要求君主具有仁义的政治德行，也要求臣子具有仁义的珍贵品格。《离娄下》里提到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孟子王道政治体系下君臣关系表明君臣彼此的亲密性。但是建立并保持这种关系蕴涵着对君主德性与美德的要求。唯有君主具

有内在的仁义之德性，才能善待臣子，臣子才能诚心诚意辅佐国君，君臣关系才能和谐。君臣只有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官僚系统才能正常运行，才能完成教化百姓和实现百姓“善”的使命。其目的还是为了民的善性。一方面，只有君臣有为政之德，才能确保仁政实施和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君主和大臣只有具备了内在道德性，才能有能力和培养人的善性，给人做出表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孔子和孟子都认为君主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应该是内在德性自然显发的表现，并非有意而为之的外显。它把君主的内在德性看作是君主的外在政治德行，而政治德行只有建立在君主的内在德性之上才能获得合法性。因此，从本质上讲，君王的国家治理就是以内心修养来实现其统治目的和效果。

二、荀学思想分析

《荀子·性恶》中说：“故性善则去圣王”。该论断体现了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尖锐批评与深刻反思。荀子认为，孟子所倡导的性善论，在理论上虽具有某种理想化的色彩，但在实践层面却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可操作性。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并且认为孟子所提倡的性善是对王道教化合法性的否定，即否定了圣王教化存在的意义，因为它预设了人性本善，从而弱化了圣王与礼义教化在人性完善与社会治理中的关键作用。荀子从“性恶论”出发，强调人性本恶，但正是这种“恶”为圣王的教化提供了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人性中的恶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礼义的熏陶以及法度的约束来加以改造和提升，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秩序。因此，圣王的教化不仅不是多余的，反而是不可或缺的。圣王通过制定礼义、建立法度，引导人们向善，使社会得以正常运转，这是性善论所无法解释和替代的。

荀子的政治主张偏向帝王本位和贵族本位，但是荀子也注重人民群众。荀子重君权是为百姓谋利益，他抬高君权的地位就是要节制那些肆无忌惮的诸侯和大臣从而确保百姓的平安快乐。但是有些学者却认为荀子并不是实意重民的人，他只是将民众视为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如学者王杰在文章《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论诠释》中认为荀子思想里君主看重百姓是因为百姓关系到国家兴衰。人民不具有自主性是达到平衡与稳定国家结构的一种手段与方法。《荀子·王霸》中写道：“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荀子呼吁最高统治者要正义爱民才能争取人心。统治者是怎样争取人心的？荀子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统治者在执政和施政过程中，要时刻以礼义兼备和法度为准，而不是以统治者个人喜恶为标准。荀子强调，统治者争取人心的关键在于“礼义兼备”与“法度严明”。这意味着，在治理国家时，统治者不应仅凭个人好恶行事，而应遵循既定的礼义规范和法律制度，确保决策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他提出，礼义是引导社会风尚、塑造民众品德的基石，而法度则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的利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荀子进一步指出，统治者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认为，统治者作为国家的领袖和民众的楷模，其言行举止对社会风气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因此，统治者应当时刻注

意自己的言行，确保自己能够成为礼义的践行者和法度的维护者。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民众嗜好礼义、奉行法度，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稳定的政治局面。即欲使天下百姓嗜好礼义、奉行法度，统治者应首先作好表率，树立楷模，以作为对天下百姓的指导与教化。

我们不难发现荀子对善与恶都有着各自的界定。换句话说，在讲荀子“性恶”时，不可能以别人对善与恶的解释来阐释荀子人性论。荀子一方面主张人性恶，另一方面也落脚于现实社会的矛盾。荀子的圣王观继承了孔孟的思想，但由于他与孔孟对人性定位的不同，因而其圣王观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孔孟对人性寄予厚望，因此圣王只是圣人在政治领域的附庸；而荀子的人性论则较为复杂，在他看来，生命中存在着好利恶害等自然欲望，沿着这种自然欲望无节制地发展下去，将会和有限的资源发生矛盾，进而导致社会混乱，所以荀子认为人性恶。荀子主张社会的芸芸众生都要靠圣王礼义来指导以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所以人性论是荀子破解圣王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依据。

三、分析“独尊儒术”中蕴含的孔孟之学与荀学思想及区别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措施，旨在强化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一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家思想与其他学派的交融。儒家思想本身包含着对人性、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深刻思考，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现却使得其他学派的声音逐渐被抑制。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也限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空间。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下，儒家思想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这导致了儒家思想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统治者希望通过强调儒家思想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儒家学者也借此机会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这种相互关系使得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支柱，但也使得其他学派的声音渐渐边缘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儒家思想的确起到了推动和主导的作用，但并非意味着儒家思想是完全孤立的。儒家思想在与其他学派的交流中逐渐吸收了一些外来元素，并且儒家学者也常常受到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这种交融与互动，塑造了儒家思想的多维发展，使其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也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演变。

孔子与孟子之学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们代表了儒家学派的核心观点。孔子注重道德修养与仁爱之道，主张通过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社会和谐。与此不同，孟子更加注重人性的本善，提倡人性向善的天赋本能，并通过教育来引导人们实现良好的品德。这两位儒家先贤的核心观点强调了道德伦理与人类行为的重要性，为儒家学说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荀子思想则与孔孟之学形成鲜明对比，突显了儒家学派内部的差异。荀子强调人性的恶劣一面，认为人天生贪婪自私，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制来约束和规范社会。他主张法治胜过德治，强调权力的重要性。这与孔孟之学的理念形成明显对立，揭示了儒家学派内部关于人性本质和社会治理的分歧。儒家思想的多元化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孔孟之学和荀子思想作为儒家学派的两大支脉，相辅相成地贡献着丰富而复杂的

观念体系。孔子注重仁爱、礼义，倡导以仁德为中心的道德修养，提倡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荀子则强调人性的恶，主张通过法治来规范社会秩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为儒家思想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孔子与荀子的思想差异既表现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也体现在对政治治理的理念上。孔子追求的是君子治国，通过仁爱来感化百姓，实现道德的自觉。而荀子则更加注重法治，主张严明的法度和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差异既反映了对人性本质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在实现社会和谐中的不同路径选择。然而，孔孟之学与荀子思想的分歧并非孤立存在，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孔孟之学与荀子思想的差异与其在儒家主导的时代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发展轨迹。

四、结论

孔孟之学、荀子思想以及儒术传承的历史演变，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极为重要且引人深思的议题。首先，孔子和孟子代表了儒家思想的两大主流流派，他们强调仁爱、礼义等传统伦理观念，并注重个体修养与社会和谐。然而，在荀子的思想中，更突出了对人性本恶的看法，主张通过法治来规范人的行为，形成一种相对严格的道德体系。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在儒家内部引发了许多理论争鸣，也为后来儒家传统的复兴留下了思想渊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逐渐演变并形成多元化的传承体系。在战国时期，荀子的观点为儒家注入了更为现实和功利的元素，同时也激发了后来法家、道家等不同流派的崛起。然而，即便存在不同的思想分支，儒家一直保持对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影响。随着历史的推进，儒家传承经历了多次挑战和复兴。在秦始皇时期，儒家遭到了罢黜百家独尊的冲击，然而并未因此而灭绝。相反，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们通过隐居山林、保留经典等方式，使儒家思想保持了一定的传承。在汉代，儒家重新崛起成为官方思想，进一步推动了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演变历程既是对孔孟之学和荀子思想的继承，也是儒术在中国思想传统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见证。

然而，尽管孔孟之学和荀子思想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它们却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联系。孔孟之学与荀子思想在汉武帝时期成为两股力量，共同维护并传承儒家的核心价值。这种多元性既是对当时政治体制的回应，也为儒家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孔孟之学与荀子思想的对比中，我们发现了它们在人性、道德等核心观点上的明显分歧。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下，儒家思想在孔孟、荀子的论辩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融合。通过对历史演变的考察，我们认识到孔孟之学、荀子思想与儒术的传承不仅有着复杂的纷争，更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趋势。最终，儒家思想展现了多元而丰富的面貌，孔孟与荀子的思想在这一多元化中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儒学的深厚基石。

参考文献

- [1] 刘洋,朱连增.简析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 [J].现代交际,2023,(11):84-90+123-124.
- [2] 宋化玉.“君主本位”还是“君子本位”:论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两条线索[J].孔子研究,2023,(05):106-116.
- [3] 邹莹.“以德致位”——荀子的政权正当性理论[J].孔子研究,2023,(05):117-126+160.
- [4] 郑济洲.“独尊儒术”新批判:今古辨异与董仲舒之真意[J].东南学术,2023,(05):108-117.
- [5] 孙晓春.孟子仁政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J].理论与现代化,2023,(04):39-49.
- [6] 刘刚.论“正政”——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简析[J].中国哲学史,2022,(05):5-10.
- [7] 徐江浩.荀子圣王思想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2.
- [8] 郑治文.礼法、君子与秩序——荀子礼法思想论析[J].管子学刊,2021,(03):40-49.
- [9] 曾筱琪.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21.
- [10] 曹颀晨.论荀子的政治思想[D].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8.

Analysis of Confucianism and Xunzi's Thought Within the "Exclusive Advocacy of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Xian Xian

(College of art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China,450000)

Abstract: In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the thought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exhibit distinct differences from those of Xunzi, while the ideology of "abolishing all other thoughts in favor of Confucianism" represents a distorted yet rich historical episode.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ideology and Confucianism,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viewpoints held by Confucius and Mencius versus those of Xunzi's thought. Furthermore, it reveals the profound impacts that both Confucianism and Xunzi's thought had on the Han Dynasty's adoption of the ideology of "abolishing all other thoughts in favor of Confucianism." Initially, the Confucianism advocated by Confucius and Mencius under the banner of "exclusive advocacy of Confucianism" gradually became blurred during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he Han Dynasty. However, Xunzi's thought, in its adaptability to historical changes and advancements, was integrated into this process, fostering a codependent relationship that further elevated the supremacy of monarchical power to new heights.

Keywords: Exclusive advocacy of Confucianism; the thought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Xunzi's thought